

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

黄兴涛 陈 鹏

摘 要:“黄色”由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转成与色情淫秽之指代并列共存、具有内在含义矛盾的词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互动的产物。作为负面贬义的“黄色”,表现出传统词义的一种变态,在社会环境演变和语境变量中,因经历所指和能指的开张组合、伸缩变化,与西方语词“黄色新闻”等概念中的黄色原义也有脱离。考察“黄色”内涵迁延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这一转变得以完成的时代因缘和文化意蕴,可以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予人启发。

关键词: 黄色 黄色新闻 黄色文化

近年来,时常有学者或文化人从中国民族文化自尊的角度强调,不宜再将“黄色”一词作为色情和淫秽的代名词来使用。他们认为,这一中国传统语境中本来象征高贵和尊严的色彩词,其含义的剧烈转变其实历史并不长,不过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动的变异产物。^①然而这些文章未能深入探讨“黄色”一词内涵演变的近代轨迹,也没有深刻揭示其“淫秽”含义在中国得以生成的具体历史过程、时代契机与因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所潜藏的文化意蕴。故此,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作出新的研究努力。

一、传统语境下“黄色”一词内涵的基本倾向及近代延展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赤橙黄绿青蓝紫都不仅是只表示物理含义的颜色词,而且还被赋予各

^① 此前相关的讨论如石琪:《反对炎黄子孙用“扫黄”》、古德明:《也谈“黄色”》,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993年第1期;陈培基:《善与恶岂可同名?——也谈“扫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993年第2期;宋飞等:《可怜尊贵黄色陷囹圄》,《环境》1999年第6期;南疆:《勿以“黄色”代“色情”》,《文史杂志》2005年第2期;曹振宇:《恢复黄色的高贵地位》,《美与时代》(上半月),2006年第5期;奕言:《“黄色”的尴尬》,《书城》2008年第12期,等等。这些文章都很短,缺乏考证性质的分析。另外,还有一些谈颜色文化的论文和著作,对此问题也常有所涉及。在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王全书又作出“不宜将黄色作为色情代名词”的郑重提议。他还建议将流行的“扫黄”之类说法,也改为“扫秽”或“扫色”等等,参见王全书:《将“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刍议》,《大河报》(电子版)2010年3月6日。

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基本上属于被崇尚的颜色。不仅汉民族很早就尚黄，很多与“黄”相连的组合词汇，多富积极含义，而且在藏族和维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现象。藏传佛学的知名研究专家扎雅·罗丹西饶活佛说：“黄色作为佛之增业的本色，是福、禄、寿、教证（指教法和证法）兴旺发达的象征。人们把黄色作为尊贵、高尚的象征，特别尊重。”^①这与蒙古族和汉族里的佛教文化相通。^②在维吾尔族文化里，黄色象征着“丰收、阳光、高贵”，黄色为金色，这种意念化的延伸与古代维吾尔人崇拜太阳神的信仰有关。^③

时至近代，种族的肤色区分及其西方知识也影响了中国人对“黄色”的文化感知。据汉学家冯客研究：“在欧洲，黄色种族的观念也许起源于17世纪末，乃是对耶稣会士关于黄色的符号价值之记载的反应……‘黄种人’的观念在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被迅速普及。它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就种族分类而言，尽管分类图式各异，但“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当他们援引肤色标准时，却建议使用白种、黄种和黑种这样的分类法。这一三分的图式与诺亚的三个儿子相对应——山姆（Shem）、加弗斯（Japheth）和哈姆（Ham），他们的后代分别居住在三块大陆。”^④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和对抗中，对自己“黄种”的肤色和“黄种人”的归类，逐渐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之德皇威廉二世等有感于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日益强盛的现实威胁，在西方鼓噪“黄祸论”，又从反面刺激和强化了这一意识，为中国传统的“尚黄”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20世纪初年，中国人的黄种自觉意识空前高涨。当时国人对“黄”和“黄色”等字词格外敏感，特别是那些以黄帝作为祖先的革命者，往往以“黄”字自名，用于表明自己的汉族认同并致力于激发同类的民族与种族自尊观念。如黄轸更名为黄兴，陈天华取笔名为思黄，秦力山的笔名叫巩黄，章士钊的笔名竟有黄藻、黄中黄、“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等等。

由于西方种族学知识的传入和民族意识的强化，20世纪初年的革命者产生了总结传统“尚黄”文化的自觉。国粹派代表刘师培作于1905年的《古代以黄色为重》一文，开篇就写道：“近代以来，种学大明，称震旦之民为黄种。而征之中国古籍，则五色之中，独崇黄色。”刘师培通过整理汉籍里“黄”的用法，提出黄训为光，“故震旦支那之义，皆起于光辉”；同时，黄与皇通，“故上古之君，皆称为皇。黄帝者，犹言黄民所奉之帝王耳”；女娲抟黄土为人，为“富贵贤智者”之谓，实不得完全以荒谬斥之，强调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名著《黄书》所以以“黄”字命名，正体现了此种精神，等等。^⑤刘氏此文是对传统“尚黄”文化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也是他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当时兴盛的种族和民族革命浪潮的一种独特呼应。

进入民国后，对“黄色”的文化尊崇并没有因帝制的覆灭而消亡，而是得到进一步延展。1923年，闻一多在诗作《色彩》里称，“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⑥其中，黄色仍然被视为民族“忠义”文化的代表。1925年，《东方杂志》发表《颜色与心理》一文，依然强调“‘黄’是色中最庄严的一种。我们一见宫殿的金碧辉皇，寺院的庄严灿烂，无有不起一种崇拜偶像之感。这便是我们感觉黄色的一种习惯的反应……黄色含有表

① 扎雅·罗丹西饶：《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丁涛、拉巴次旦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汉文版序第5页。

② 除了儒佛之教崇“黄”外，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呈现出一种尚黄的特色。参见姜生：《道教尚黄考》，《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

③ 乌买尔·达吾提：《维吾尔语颜色词的文化特征探析》，《语言与翻译》1999年第1期。

④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72页。

⑤ 《刘师培全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⑥ 《闻一多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2页。

彰‘尊严’和‘高贵’的意味”。^① 1929年，一篇题为《我们的黄色》的散文凝聚了新的时代政治文化特色和现代民族自觉内涵，以喷薄的激情和诗一般的语言，真挚和热烈地拥抱“黄色”，反复声称“我们是黄色的我们！我们爱我们的黄色！”：

我，素性喜欢黄色，喜欢我的黄色胜于其他各色：因为红绿，在我的眼里，是虚饰的象征；黑白，在我的神经上，是相争底表示。只有那诚实而和平的黄色，最惬我的心，最能博得我的爱慕。……

……为我们所足践的，是结实的黄土；为我们所身衣口食的，都是从黄土中生产出来的。黄色是我们的人种；黄帝是我们的族祖；黄河两岸是我们所居的可爱的家乡。我们所宗所有的都系黄色；黄色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一切于斯的本色。黄色的我们，难道不喜欢，不爱慕我们的黄色吗？

我们既是黄色的人，应该保护我们黄色的纯洁，发扬我们黄色的精神，光耀我们黄色的华彩；使红绿自愧其污秽，使黑白不夸其纯单，使其他各色渐渐地同化于我们的黄色！

我盼望黄色的人们，宁死也不愿丧失我们固有的色彩。……

我们是黄色的我们！我们爱我们的黄色！^②

这里，一种以黄种及自身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民族认同观念，已经蕴藏其内。这或许是当时国人表达尊崇民族色彩之黄色最为生动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1934年，时任广州市长的刘纪文郑重提议定黄色为市色，明确从象征色彩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阐述理由，他在提案中写道：

近世各国，关于国制之旗帜器服，莫不有其规定之色素，以代表其国家民族之精神，至其他各大城市，亦多有采用某色以代表其区域之精神者，是知色素之与国家民族及地域关系之为何如矣！本市民物繁庶，为西南各省都市冠，复以其对外交通便利，已渐跻于国际都市之林，实中外观瞻所系，自宜规定市色，以崇体制而表精神。查七色之中，以黄为尚，夫五行于土色为黄，是广土众民之义也。五方于中央为黄，是致中和育万物之义也。又黄老人也，诗乐只君子，遐不黄耆，则绵历久远之意存焉。又黄稚年也，男女始生为黄口，则发荣滋长之意存焉。况我族为黄帝轩辕氏之后，古称黄虞，又曰黄炎，黄之历史已久，黄之意义弥彰。因拟定黄色为本市市色。是否之处，合提请公决。^③

该提案经该市第131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黄色因此一度成为广州市的市色。这一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表明，时至民国中期，20世纪初年所形成的以“黄色”作为民族国家象征色彩的概念含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继承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它继续构成许多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及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中国人长期珍重、近代以降又格外赋予其民族象征意义并声称应“保护其纯洁”的“黄色”，在社会流通层面竟然迅速地加入了庸俗和淫秽之义，而且这一负面含义日益显豁和占优，与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矛盾并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有关“黄色”概念的传入，无疑产生了直接影响。可是，这些概念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其影响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解答。

① 《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4号。

② 黎祯祥：《我们的黄色》，《我们的教育：徐汇师范校刊》1929年第3卷第6期。

③ 《市长提议拟定黄色为本市市色意见案》，《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1934年第487期。

二、“黄色新闻”与“黄色工会”：西方贬义的黄色概念传入中国考

在英文里，作为黄颜色对应词的“Yellow”，除了表颜色的本义之外，亦带有一些贬义色彩，1918年出版的《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就标示其“嫉妒、忧郁、怯懦、吝啬、卑劣可耻、骇人听闻”的含义，^① 此类基本语义延续至今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② 且一直未见色情、下流、淫荡之意味，而英语世界真正与色情相对应的颜色词应该是“Blue”，指（电影、笑话、故事等）含有性欲或色情内容，如色情电影即称“Blue Movie”。^③ 在俄语、法语和德语等语言里，表示黄颜色的词汇，象征意义特别是消极含义虽有差别，但也均无直接的淫秽内涵。^④ 实际上，要想找到主淫秽含义的中文“黄色”一词的概念来源，无法直接从外文颜色词里面得到现成答案的。只能先回到中文世界，从相关的外来词演变本身去找线索。

据笔者查考，在近代中文词汇里，来自西方、带有“黄色”二字且真正传播开来的外来词和新概念，其实只有五个，它们都是复合词，即“黄色新闻”、“黄色工会”、“黄色国际”、“黄色组合”和“黄色贸易”。尤以前两个影响较大。

黄色新闻，英文作“Yellow Journalism”或“Yellow Press”。1929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录了该词条，指出在19世纪末报纸发行量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股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新闻浪潮风靡美国，此类新闻被称为“黄色新闻”。其中普利策和赫斯特两位报人的竞争将此风推向极致，其影响在于很多报纸因此改变了内容特色，并采用通栏大字标题等手法。^⑤ 新近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更给予其明确定义，标明黄色新闻“指报纸出版中利用过分渲染的文章和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吸引读者和增加销路”，并进一步指出其利用彩色连环画和大量图片的做法得到广泛使用。^⑥ 《大美百科全书》则特别说明“黄色新闻”系不惜编造不以事实或主题为依据的新闻，突出报导犯罪行为、性行为、暴力事件等，并详细介绍了两家报纸利用衣衫褴褛、长着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外衣印上一层淡淡的黄色的“黄色小孩”展开竞争的情形，“黄色刊物”、“黄色新闻”等专门术语也由此而生。^⑦ 在《苏联百科词典》里，列有“黄色报刊”一词，解释是：“竞相发表耸人听闻的丑闻和虚假消息的反动资产阶级报刊。”不难看出，“黄色新闻”一词产生至今，西方人对它的诠释尽管各有侧重，略显差别，甚至被赋予明显的阶级意味，但捏造、夸张、刺激、渲染、耸人听闻的核心内涵一以贯之，没有多少变异，更无法从中直接推出色情、下流、淫秽的特指语义来。

①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 1918, p. 2361.

②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042;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Glasgow: Harper Collins Pub., 2006, p. 1861.

③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 182.

④ 参见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大俄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21页；薛建成主编译：《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第1069页；肖金龙：《中德语言颜色象征意义对比》，《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等等。

⑤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Lond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o. Ltd.; New York: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29, vol. 16, p. 357.

⑥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07, vol. 12, p. 832.

⑦ *Encyclopedia Americana*, Danbury, Conn.: Scholastic Library Pub., 2006, vol. 29, pp. 663-664.

黄色工会，英文作“Yellow Union”。《苏联百科词典》解释为：“指领导人推行同企业主进行阶级合作政策的工会。”^①《辞海》的释义更详细：“黄色工会，一般是指被资本家收买、控制的工会。据传说，1877年法国蒙索莱米讷市一厂主收买工会，以破坏罢工；罢工工人打碎工会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糊补，故被称为‘黄色工会’。”^②这一语义在西方多个语种里均有体现，俄语里“黄色”可以表示“妥协主义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指工会等）”；法语里黄色有“破坏罢工者”的意思；西班牙语里的黄色亦可解释为“（与资方）同流合污”等等。^③可见，“黄色”一词在西方普遍渗透到政治运动之中，并程度不同地带有右翼、妥协、改良意味。该词还由此衍生出“黄色国际”（指第二国际）、“黄色组合”（指第二国际及改良派等的联合组织）等一系列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和概念，它们在民国时期，也都曾得到一定的传播。

至于“黄色贸易”，则是由“黄祸”论发展而来，指的是“日本的以绝对侵略性向欧美市场发展的一种贸易政策”。^④它与中文“黄色”的现代语义变化几无关系，也传播甚少，故毋庸多言。

下面，大体看看“黄色新闻”和“黄色工会”这两个影响较大的西来概念在中文世界里的传播情形。

就笔者所见，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就已有文章从批评的角度谈到了“黄色纸”。其文曰：“美报固有一大缺点……即置重兴味轻视事实是也。此种恶风，行之已久，今可谓达于其极。阅报者即对于实事，常疑美报为虚中构造，是非受黄色纸之反动。”^⑤这里的“黄色纸”指的是刊载捏造不实报道，以迎合读者趣味的不良报刊。由于该文是专门谈论世界各大报纸的内容并进行比较，故其介绍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四年后的1918年，该杂志登载一篇专门记述纽约报纸的文章，又使用了“黄色新闻纸”概念，提到：“有所谓黄色新闻纸者，犹言轻薄之新闻纸也。考其语源，则纽约世界报，于日曜附录中，好以儿童入画。而画中之儿童，又必着黄色之衣服。世人则以此为其挑拨性之隐语。”^⑥直接赋予“黄色报纸”以轻薄、挑拨之特质。这种摄义取向，为以后的可能转义埋下了伏笔。

1924年，《国闻周报》有人专文介绍美国的新闻事业，对“黄色新闻”的外延作出明确界定，认为黄色新闻就是那些刻意动人耳目、惊人听闻的新闻，而“所谓动人耳目之新闻者，不外乎各地暗杀、抢劫、离婚、苟合之事”。^⑦1933年，《申报月刊》的“新辞源”专栏，更有对这一概念的特别介绍：“黄色新闻（Yellow Press），是指将某种琐屑的新闻，借记者的一特殊活动，而使成为一件‘特别纪事’之谓。此种新闻的特色，就在于‘新奇动人’。因之他是不惜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将一新闻，加之以特别的渲染，成为一夸张曲折的特别纪事。”作者并强调，此类新闻做法在中国“似正盛行于各报之间”。^⑧这些介绍虽然还很零星，但大体准确地反映了“黄色新闻”和“黄色报刊”在西方的基本内涵。

① 《苏联百科词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542页。

② 《辞海》第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964页。

③ 参见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大俄汉词典》，第521页；薛建成主编译：《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第1069页；孙义楨主编：《新时代西汉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4页。

④ 《黄色贸易》，《申报月刊》1935年第4卷第3号。

⑤ 《世界新闻纸内容之比较》，《东方杂志》1914年第10卷第11号。

⑥ 持三：《记纽约世界报》，《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9号。

⑦ 汪英宾：《美国新闻事业》，《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14期。

⑧ 《黄色新闻》，《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11号。

在随后的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国内对“黄色新闻”概念的介绍和使用逐渐增多，认识和理解也日益丰富、具体。不仅有些专业的新闻学研究刊物对西方的“黄色新闻”进行介绍和评论，还有一些社会上流行的大众知识辞典，也都将该词收录其中，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如193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主办的《新闻学期刊》，有两文谈到美国的“黄色新闻”，一则强调“黄色化”的普遍为近代美国新闻事业特点之一，指出“所谓黄色，其意系指用黄金万能的手段，为办报方针的报纸。换言之，即是办报者不惜巨金，聘请优秀之记者，收罗足以骇人耳目的新闻，用劝诱夸张的编辑方针，使中下层读者对之极感兴味”。^① 一则将“黄色新闻”作为“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东西”加以谴责，认为它充满着威吓、哄骗、诬蔑、麻醉，是“民众的仇敌”。^② 这一极端负面化的认知几年后在燕京大学新闻学会主办的《报学》里得到回应，有学者著文干脆将“黄色新闻”理解为“罪恶新闻”，认为中国小报为了维持生计，“将罪恶新闻扩大、渲染，使之能迎合低级趣味，而吸引更多的读者”，这违反报业道德，贻害社会。^③

相比之下，当时一些词典对“黄色新闻”的解说，似更能反映其社会化传播的水准。1936年，《大众实用辞林》已收录“黄色新闻”一词，认为“黄色新闻”是新闻纸的第四版，所载多为社会的琐事。^④ 1937年，《现代知识大辞典》的专门词条则认为，“黄色新闻即专登软性的‘社会新闻’，铺张扬厉，绘声绘影，以吸引读者。”^⑤ 1940年，《抗战建国实用百科辞典》将黄色新闻解释为“指报纸上所记载关于盗窃、风化及其他一切足以合迎一般人的低级趣味的新闻”。^⑥

可见在内容上，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黄色新闻”之负面意义，不仅包括刺激、暴露、捏造、污蔑、挑拨、欺骗、麻醉，也包括了软性、轻薄、低级趣味等等方面。而就低级趣味而言，则多是泛指，不仅涉及所谓风化，也指涉盗窃、暴力等等方面的新闻。如1936年，左翼作家夏衍在一篇影评中，就用“黄色新闻”专门指代盗匪之类的新闻。^⑦

不过也应看到，这一时期已有用者有意无意地将黄色新闻与色情相关的词汇、事件混用，体现出一种向后者转化的过渡性倾向。正是在这一类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过程中，“黄色新闻”原本包含的色情部分，在寓意范围内被逐步前置。比较早的，如评论家柯灵在1939年的《乐祸篇》中谈到上海色情文化的流行时，就以刊登淫文秽词、猥亵文字的小报居首，强调这些低俗的东西即是“给黄色新闻做材料”，^⑧ 这里的“黄色新闻”虽不特指淫秽、下流的新闻，但在相互混用中，已蕴涵滑向此端的可能。在古代中国，表达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感情纠葛时，往往使用“桃色”、“花边”、“粉色”这些词语，可在1941年《中国艺坛日报》的一则报道中，则明确将桃色事件纳入“黄色新闻”，^⑨ 这或许预示了“黄色”含义向淫秽进一步转化的某种可能性。

① 唐克明：《近代美英新闻事业鸟瞰》，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新闻学期刊》1935年。

② 胡子：《现代新闻事业的危机》，《新闻学期刊》1935年。

③ 首第成：《报纸与罪恶新闻》，燕京大学新闻学会：《报学》1941年第1卷第1期。

④ 蔡丐因：《大众实用辞林》，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889页。

⑤ 现代知识编译社：《现代知识大辞典》，上海：现代知识出版社，1937年，第956页。

⑥ 文化供应社编：《抗战建国实用百科辞典》，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第436页。

⑦ 夏衍：《〈怒焰〉观感》，《大晚报》（上海）1936年8月9日，后载入《夏衍全集》（电影评论·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⑧ 柯灵：《柯灵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8—229页。

⑨ 《桃色事件：黄色新闻》，《中国艺坛日报》1941年3月23日。

值得指出的是，到40年代中后期时，“黄色新闻”语义的变异忽然加速，色情的主导含义得以迅速确立。如前所述，“黄色新闻”因为其自身即蕴涵低俗新闻之意，而此类新闻又不可避免地大量涉及男女关系、色情、淫秽之事，故易被与表示色情意义的词汇混用，久而久之其原来多方杂陈的广泛意义范围逐渐萎缩，色情、淫秽之意则愈发凸显。同时，对于这一时期“黄色”词义的扩散而言，“黄色新闻”的酵母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其淫秽庸俗的含义波及其他文化部门。而“黄色”在“黄色音乐”和“黄色电影”等领域里被极端狭隘的“色情”化使用，反过来，又进一步约定了“黄色新闻”的淫秽含义。

这一时期，人们在谈论“黄色新闻”时，常常将其与“诲淫诲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少报刊在介绍“黄色新闻”时，总爱冠以“诲淫诲盗”之类的修饰词，而所列新闻，也多为社会新闻中猥亵、卑鄙之事。^①有人甚至谴责黄色新闻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之淫乱盗窃，报纸加以宣传后，使淫乱盗窃者技术越发高超。”^②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厉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要求减少刊载黄色新闻，直接将其与低级趣味等同起来，指责其“不是荒唐，便是无耻，自然更没有教育的意义”。^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会主办的《新闻学季刊》登载《新闻道德之研究》一文，明确认定“黄色新闻”一味地偏爱夸张渲染之手法，势必走向低级趣味：“为满足读者之好胜心理，集中注意力于污秽故事，人家私事，淫书淫画等。”^④这既是时人从专业角度，对“黄色新闻”走向淫秽内涵之趋向和成因的一种分析和警告，同时也表明这一走向在当时已经或正在进一步地成为新闻的现实。

“黄色新闻”色情含义的强化和形成，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这一时期，已有学者对所谓“软性新闻”、“花边新闻”和“黄色新闻”进行自觉区分，认为前两者意在调剂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新闻工作者对于各种含有趣味和幽默感的逸闻趣事，用轻松的笔调，加以报道和刊载的可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个花边，取一个富有趣味的标题，未尝不可。但若是掺杂了低级趣味的因素，有伤道德风化，则失去了其趣味之价值，这才流为“黄色新闻”。^⑤还有人专从色彩的文化象征角度，对新闻类型加以区分，认为所谓“白色新闻”指的是歌功颂德、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地替政府宣传的新闻；“黑色新闻”即内幕新闻；作者虽未明确给“黄色新闻”下定义，但根据其后续文对上海文化的批判可以推断，那些猥亵色情、荒淫无耻、荒诞神奇、诲淫诲盗的东西即为“黄色新闻”所统辖。^⑥在此，早期“黄色新闻”包罗万象的含义已经被白色、黑色新闻所分解，意义进一步狭隘化和明确化。与此同时，以前通常所谓的“桃色新闻”之正式名目，这一时期也已明确被“黄色新闻”所替代。如1944年，《上海社会月报》在创刊号的“黄色新闻”专栏里，明确指出：“‘黄色新闻’即‘桃色新闻’，内容是绯色的，在新闻学上有这个专门的名词，扩大一点说，就是社会新闻，不过它的质素‘粉红色’一点罢了”。1946年，有杂志报道作家丁玲“恋爱成功”的消息，采用了“赤色圈里的黄色新闻”之说法。^⑦凡此种种，都证明这一时期“黄色新闻”的淫秽色情含义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① 参见《大报的黄色新闻》，《精华》1946年第2卷革新第32期。

② 许孝炎：《我所见到的中国新闻事业》，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编：《新闻学季刊》1947年第3卷第1期。

③ 唐汕：《新闻副刊的社会意义》，《申报》1947年6月27日。

④ 《新闻学季刊》1947年第3卷第1期。

⑤ 胡博明：《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大众新闻》1948年第1卷第6期。

⑥ 知微：《上海，这没有文化的城》，《人民世纪》（南京）1949年第1卷第3期。

⑦ 《赤色圈里的黄色新闻：丁玲恋爱成功》，《精华》1946年第2卷革新第2期。

我们还可以从1947年至1949年间,一些新闻界的学者有感于国人对“黄色新闻”原意的扭曲,撰文为“黄色新闻”正名的事实,从一个侧面验证上面的判断。1947年,邵燕平撰写《“黄色新闻”的罪恶》一文,提出:“国人每聆‘黄色新闻’四字,多引起桃色故事的联想,以为男女、三角等问题等构成的事件,称为‘黄色新闻’,实则黄色新闻包罗颇广,初不限于男女、三角等问题所构成的事件”。^①1948年,一篇题为《黄色新闻的起源》的文章,也对当时人们误解“黄色新闻”的原义,提出辨析。指出:“其实这名词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新闻学上已是个众所公认的称谓,并非任何人所杜撰……现在中国所谓‘黄色报纸’,是指的一般四开小报,也就是那些不以报道正式新闻为主体,而专门刊载内幕新闻侧面消息以至主要用低级趣味吸引读者的小报,这种报纸,其实与新闻史上所谓的‘黄色新闻’,颇有不小的差别。”作者因此回溯了美国“黄色新闻”起源的种种故事,指出西方黄色报纸“专以刺激感情方式处理新闻”为特征,并特别强调,西方“黄色新闻”那种内具的自由正义的追求之内涵,实远为当时的中国新闻界所不可企及:“现在的小报还算不了黄色报纸。即使‘黄色’也罢,如果能像普列哲那样为自由正义而奋斗,在今日的中国到是应该欢迎之不暇的。”^②这种对中西方“黄色新闻”内涵差异的批评,说明这一时段“黄色新闻”词义被歪曲和误解,绝非零零星星的个别现象,而是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黄色新闻”的色情含义已经为社会广泛采纳和接受,但基本正确的理解和使用,在一部分人那里是依旧存在的。^③

同“黄色新闻”相比,“黄色工会”及相关词语内涵的输入和传播,则要清晰和简单得多。据笔者所见,早在1921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俄文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里,就提到:“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这里的“黄色”带有阶级调和、改良之意,同时也表明这一语义承袭了苏俄的理解。在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1925年《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等文件里,^④又用到“黄色国际”、“黄色工会”等词,也都是沿袭苏俄的用法。在以后的中共文件里,这一语义被大量、反复使用,用来指斥国民党领导下的工人组织。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色工会”等词广泛流传到社会。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辞典收录并介绍了这些词汇和概念的含义。如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就说黄色“为右翼、妥协的渐进派和改良派的象征。赤色为左翼、战斗的激进派和共产派的象征。中立派则属于桃色”、黄色国际指“第二国际”、“黄色组合”则是“对赤色组合讲的话,又叫做阶级协调组合”。^⑤同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新术语辞典》亦持同样看法。1936年出版的《大众实用辞林》也解释说:“黄色国际就是第二国际;黄色组合谓主张劳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组合”。^⑥1937年,《现代知识大辞典》则说明:“黄色工会指不主张革命、赞助劳资协调的工会”。^⑦类似

① 邵燕平:《“黄色新闻”的罪恶》,《新闻学季刊》1947年第3卷第2期。

② 且文:《黄色新闻的起源》,《大众新闻》1948年第1卷第4期。

③ 参见姚炯:《取缔黄色新闻》,《申报》1945年4月28日;吴啸亚:《宣传工作之检讨与意见具申》,1948年8—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0页。两文中所提的“黄色新闻”均为恶意渲染之新闻,而无淫秽意味。其他类似例证不赘引。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70、327页。

⑤ 高希圣等:《社会科学大词典》,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256、646页。

⑥ 蔡巧因:《大众实用辞林》,第889页。

⑦ 现代知识编译社:《现代知识大辞典》,上海:现代知识出版社,1937年,第956页。

的例子不一而足，其传播之广泛可见一斑。

有关西方黄色这一语义的传播，还体现在国人特别是左翼文化人的有关实践中。丁玲作于1932年的《五月》一文，就有“白色”和“黄色”的资本家与买办们的说法。^①夏衍1933年发表的《关于〈脂粉市场〉之结尾原编剧人有所声明》一文，则有“黄色之欺骗与自慰的梦想”的句子。^②“黄色”都是在贬义上使用的。

“黄色工会”一类词汇中的“黄色”用法原本与色情无关，但增添了“黄色”的负面意味，很容易与颓废、麻醉、腐朽等词语概念联系起来，故在后来“黄色”词义实现变异的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三、“黄色”一词淫秽含义的生成、扩散与定型

“黄色”一词成为色情的代名词，与“黄色新闻”有直接关系。但该词的含义在中国从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新闻，到狭隘化成淫秽色情新闻的转换，既不是孤立地在新闻学内部实现的，其最终的社会化，也是“黄色”一词跳出新闻业以后，波及其他诸多文化领域后才得以形成的结果。

这种以“黄色”为纽带的跨领域文化互动，早在1930年代中后期就已星星点点地出现。如1935年，即有人将专注于描写女明星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新闻称作“桔色新闻”，并解释说“桔色系粉红色与黄色的混合色”。^③这里，粉红色有传统色情的意味，黄色则突出了新闻刺激、轰动的现代含义，可见两种颜色的合流趋势已然出现。同年，影星阮玲玉自杀，一时间“阮玲玉香殒记”一类的戏剧多如雨后春笋，阮氏的感情纠葛成为卖点，戏剧揭人隐私、报道内幕的夸张渲染成分昭然若揭，故时人称：“倘例诸‘黄色新闻’名词，此可谓‘黄色新戏’矣。”^④不过，此处“黄色”的西方语义尚未完全变化。到1939年，有读者给《电影新闻》来信，痛斥上海人“黄”颜色特别浓：“喜欢读战事新闻中间的‘敌兵怎么怎么样子的奸淫女同胞’之类的‘豆腐’，‘寻开心’之类文字。此类黄色杂志在上海层出不穷。”^⑤这里的“黄色”不仅用来形容不良杂志，更推及一个城市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不过，“黄色”语词被大规模借用到社会文化其他领域的现象，还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后期以后。正是在这一社会化扩散过程中，“黄色”的淫秽含义得到逐步的彰显和强化，并最终定型。

1946年前后，“黄色”一词已经开始被广泛运用到一般社会刊物、音乐、电影、文学等各主要文化领域，“黄色刊物”、“黄色音乐”、“黄色电影”、“黄色文学”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相继出现。这可以说是当时“黄色”一词淫秽色情含义生成、扩散和定型的典型表现。

就“黄色刊物”而言，因为刊物与新闻同质性较强，对它的理解同“黄色新闻”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故容易直接转移。1946年，在一篇题为《论查禁“黄色刊物”》的短论里，“黄色刊物”一词就已出现，不过作者将“内容文字，诲淫诲盗，或捏造谣言，诽谤他人”列为“黄色

① 《丁玲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② 《五月》，《夏衍全集》（电影评论·上），第5页。

③ 陈歌辛：《进退漫谈》，《电影新闻》1935年第1卷第4期。

④ 沙：《黄色新戏之广告》，《北洋画报》1935年4月27日。

⑤ 耳食：《陈云裳与上海的黄色》，《电影新闻》1939年第1期。

刊物”的基本特点,^①虽未局限于淫秽和色情的范围,但已明确指向了低级趣味,且首揭“诲淫”之义。次年,沈标在《介绍黄色刊物》一文中,对其内容的界定也是:“黄色刊物,终是包罗万象的。有因果报应的故事,有卿卿我我,鸳鸯蝴蝶的章回或不章回的小说,有三角,四角,多角……有这‘奇侠’,那‘姻缘’这‘溯’那‘幕’这‘盗’那‘探’……”^②一言以蔽之,黄色刊物“集谣言之大成,尽色情之能事”。^③这些解释几乎都可以从人们对“黄色新闻”的理解里找到根源。不过,此时人们在使用“黄色刊物”一词时,已有相当多的用者开始从混杂含义里抽取并强调其“淫秽、色情”之意。如1946年,就有人指斥香港“黄色小报”专谈风月、诲淫诲盗、充满色情文字;^④亦有作者指出统治集团虽未直接制造淫书、开色情公司,但却纵容、利用色情的东西麻醉人民,于是“黄色新闻书刊的来历,人民已经怀疑了”,^⑤这里“黄色新闻书刊”的色情意义被凸出,不仅反映了而且加深着人们对“黄色”色情含义的摄取和解读。更多的文章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这一语义,如有人说:“黄色刊物”像“黄河决口似的在泛滥……软软的轻轻的豆腐干刊物……东一张‘肉照’,西一张‘肉照’”,^⑥或称“刺激‘性机能’的淫欲、强调‘色情狂’的黄色读物”等等。^⑦一篇名为《再谈“黄色刊物”》的文章认为,欣赏此类刊物的人,都是些“陶醉于色情里的飘飘然的”、“整天迷迷糊糊、不辨黑白,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只会欣赏‘大腿’”之类的阿Q们。作者大声疾呼社会各界应共同摒弃这种“荒淫无耻的东西”,肃清“惨胜以后的新麻醉剂的鸦片烟”。^⑧其“黄色刊物”里的黄色之色情含义,已经十分明显。

“黄色电影”的出现和传播,在表现“黄色”词汇淫秽色情化的主导含义方面,更加直露和鲜明。1948年,有文章批评中国电影界拍摄刺激肉欲的镜头,是“拾好莱坞的黄色之糟糠,将毒素裹在糖衣下,去麻醉一般小市民”,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买好莱坞的大腿,听爵士音乐,看神怪故事,武侠打斗法宝机关等无稽的玩意儿,更不要恐怖暗杀与自杀等害人的坏货,肉欲淫荡的毒汁”。^⑨同年,电影人夏衍猛烈抨击美国影片为“黄色的、猥亵的、赞颂着人性里面最下流最卑鄙的堕落行为的影片”。^⑩1949年,上海出现一篇名为《人民的呼声:打倒黄色电影!》的报道,直截了当地使用了“黄色电影”一词,认定其为:“毒害观众的、色情的、无稽的、荒诞的、粗制滥造的”影片。^⑪

“黄色音乐”的提法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以往人们鞭挞低俗音乐时,多用“桃色、靡靡之音、淫乐”等词,现在则找到了“黄色”这一替代品。1945年,音乐批评家杨琦撰文对当时音乐创作色情倾向的“黄色逆流”进行了批判,指出乐坛最流行的《红豆词》在曲调、和声、曲式和歌词上,专门迎合小市民胃口,“假使一个人骤然听来,又跟‘郎呀郎呀’及‘香格里拉’

① 《海光》1946年第30期。

② 《正风》1947年第2期。

③ 《文化市场上的黄色风气》,《新世代》1949年第1期。

④ 林友兰:《香港文化壁垒》,《申报》1946年5月12日。

⑤ 李亥:《谈色情文学》,《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3日。

⑥ 水深:《漫谈黄色刊物》,《宁波日报》1946年10月14日。

⑦ 王平陵:《今后的出版事业》,《申报》1946年8月2日。

⑧ 桐华:《再谈“黄色刊物”》,《人民世纪》(天津)1946年第1卷第4期。

⑨ 《太太万岁》,《益世周刊》1948年第30卷第11期。

⑩ 夏衍:《推荐〈丹娘〉》,《华商报》(香港)1948年4月24日,后载入《夏衍全集》(电影评论·上),第211页。

⑪ 《青青电影》1949年第17卷第16期。

等黄色歌曲有什么分别呢”。他指摘该歌曲的创作者刘雪庵“连头也不回地走向黄色音乐的道路上去了”。^①该文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使用该词的文献。^②1946年,一篇题为《清除靡靡之音》的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淫靡软媚的乐曲”提出批判,希望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不只是停留在召开“清除黄色音乐座谈会”的层面,还要能真正将会议所决定的事项,一一付诸实现。^③实际上,当时多数使用者,都将“黄色音乐”归为“色情娱乐”^④的范畴,或谓“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含义粗俗下流”,^⑤或称“淫靡风气”^⑥等等。正由于“黄色音乐”已经成为靡靡之音的代名词,故当时即有论者专门对此提出辩论,认为“黄色音乐”的坏处,还不仅限于歌词的淫荡,更在于其“情感不真实”,缺乏曲调与和声之美。^⑦值得一提的是,早年因大量创作、演唱流行歌曲的黎锦晖、黎明晖父女此时分别被冠以“黄色音乐的始祖”和“黄色歌手”的头衔。^⑧

“黄色文学”一词,此时也成为批判术语。对于诲淫诲盗的色情文学,各种批判早已有之,但冠以“黄色”称谓,此前尚未经见,至少还很少见,此时却被广为使用。1947年,管军的《论才子佳人小说与黄色文学》一文,将“黄色文学”界定为反映“污秽褻荡的欲念;三角四角恋爱,色情性欲”一类的作品。^⑨1948年,绍祖在其《论“黄色”文学》一文中,则强调:“黄色文学是与这靡废时代结着血肉因缘的……诱惑坠落,赋予人生一种淫乐之感,要求坠落企图压迫正义退出现实而自毙。逃避正面的人生,脱离现实,封锁人类于狭小的情欲的圈子里。忘却世界,不敢正视自己,粉红而麻木,淫逸而自卑。”作者在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后,进一步说

① 杨琦:《论音乐作品的色情倾向——从刘雪庵的〈红豆词〉说起》,《在音乐战线上》,南京:江南出版社,1951年,第119—123页。

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黄色歌曲”一词的始作俑者为聂耳,我国老一辈音乐电影人王为一、王云阶老先生在1959、1980年先后撰文回忆称聂耳曾使用过“黄色歌曲”一词,后者更是明确指出:“‘黄色歌曲’则是从三十年代聂耳批判当时那些色情的歌曲开始使用的词。”(参见王为一:《记聂耳的一件事》,原载《羊城晚报》,收入《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7页;王云阶:《从衡量靡靡之音的尺寸谈起》,原载《文汇报》1980年6月7日,收入《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37页)2007年搜狐博客上的一篇题为“国歌作者竟是‘黄色’之父”的博文也沿袭此说法,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调。(参见张锐:《感念黄色时代(二)国歌作者竟是“黄色”之父》,网址为<http://zrde.blog.sohu.com/61192203.html>)但笔者经过多方考证,均不见聂耳的著作里有“黄色歌曲”的用法,相反,在聂耳时代饱受批判的作曲家黎锦晖曾指出1920—1930年代之交,“还没有‘黄色歌曲’的称谓,归入流行歌曲之内”。(黎锦晖:《我和明月社》,《文化史料》1982年第3辑)可见将聂耳视为“黄色歌曲”一词发端者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依笔者之见,此误可能系“黄色歌曲”一词在194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流行的背景之下,人们在做回溯性质的研究时,误加诸曾对“靡靡之音”有过激烈批判的聂耳身上所致。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的著作《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宋伟航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对黎锦晖的“黄色音乐”有出色的研究,但也未对这类词汇现代含义的形成做探讨,2009年11月,他曾鼓励笔者把这一研究进行下去。特此致谢。

③ 《文化先锋》1946年第6卷第5期。

④ 言:《建设文化的首都》,《文化先锋》1947年第6卷第22期。

⑤ 卢冠六:《对于“黄色歌曲”民歌及创作民歌旧有歌曲及新创作的歌曲等之意见》,《活教育》1949年第5卷第5—6期。

⑥ 《文运会取缔黄色歌曲》,《上海教育周刊》1947年第1卷第4期。

⑦ 钱仁康:《从黄色音乐到民歌》,《音乐评论》1948年第23期。

⑧ 参见骆英:《电影·广播与黄色音乐》,《综艺:美术戏剧电影音乐半月刊》1948年第1卷第7期;《黄色歌手黎明晖如今厌恶毛毛雨》,《自由新闻》1948年第5期。

⑨ 《大地周报》1947年第93期。

道：“黄色文学以一种肉麻的滥调加上爱情的应时灵感；套上奇异的故事，再加上民主文艺的外表，既民主而又钟情，既悲欢而又合离，便完成了‘黄色文学’的奇迹。”^①同年，绍祖还用到“黄色文艺”一词，特别说明：“‘黄色’文艺，并不是说那伟大爱情的描写，而是专指它除了渲染一些色香艳丽的情欲词藻以外，根本没有内容，反映与人都是有害的。”作者认为一般的文艺作品为反映现实生活而有男女生活的描写，无可厚非，但需以“决不淫污超俗而不下流”为前提，若是“故意铺张生活的一面，把乳峰的颤动加以肉麻和神化，使之浸透于色情狂欢里”，则流为“黄色”作品。^②“黄色文艺”的淫秽含义在这里得以完全确立。同时，和“黄色音乐”传播类似，那些大写特写下流低俗的文章者，此时也获得了“黄色作家”的称号。^③

这一时期，其他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地以“黄色”批判负面对象。如随意捏造、夸张渲染的广告被称之为“黄色广告”；^④含有色情、淫秽内容的打油诗被称之为“黄色打油诗”；^⑤报道花边新闻的专栏被命名为“黄色舞台”；^⑥色情、消极、麻醉人生的靡靡之音泛滥被斥为“黄色艺术”抬头等等。^⑦“黄色”虽不尽然都是色情之义，但起码可归为低级趣味。

1946年前后，人们还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低俗文化现象，概括出“黄色文化”一词，以涵括一种整体的颓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同时，“黄色文化”自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黄色新闻”、“黄色音乐”等词语组成一个概念群。了解“黄色文化”概念内涵的变化，对于认知当时“黄色”词义的变异有特别意义，它对负面特别是色情含义的“黄色”词义的扩散，可能发挥过整合功能。

据笔者所知，1946年时，已经有人发表《略谈黄色文化》一文，开始专门讨论所谓“黄色文化”。作者认为，黄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注重趣味，富于刺激性，冷嘲热讽，大捧小骂，攻奸揭私，暴露黑暗，一种别出心裁新鲜别致的风味，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这里的“黄色”似乎还未脱离西方“黄色新闻”的原义。但作者同时指出，出版社和创作者“为了出奇制胜，争取生意眼，不得不搬出一大套噱头来，有的刊些女人大腿的照片，汉奸藏女人，要员爱娇妾的艳闻，拼命趋向低级色情的调儿。有的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一窝风的转向浅薄、胡闹，卑耻猥亵的，没落的作风”。^⑧“黄色文化”的“淫秽”内涵得到极度凸显。一年之后，著名的《时与文》杂志发表《广州的黄色文化与倒退教育》一文，^⑨其中使用的“黄色文化”概念已然呈现一种整体转向色情淫秽之义的鲜明特征。该文从多角度审视当下的广州文化，强调报纸没有一家不走“黄色”路线，多为肉麻读物；诲淫书刊泛滥全市，多是下流淫书；流行电影也是美国的“大腿电影”，充满打、情、舞、轻佻的内容，等等。

这一时期，“黄色”还独立成词，开始表达色情含义。如“黄色高潮”、^⑩“黄色气氛”、^⑪

① 《人民世纪》（南京）1948年第1卷第1期。

② 绍祖：《漫评“黄色”文艺》，《人民世纪》（南京）1948年第1卷第2期。

③ 参见杜鲁：《黄色女作家走上白衣路线：苏青化名做看护》，《上海滩》1946年第13期；林焕平：《扬弃·改造·提高：略论夺取黄色堡垒》，《今文艺丛刊》1948年第1期。

④ 李果：《论黄色广告》，《报学杂志》1948年第1卷第7期。

⑤ 《黄色打油诗，惹恼众学生》，《东南风》1947年第36期。

⑥ 《黄色舞台》，《建国漫画旬刊》1947年第4期。

⑦ 也梅：《广播流行歌曲应走的方向》，《综艺：美术戏剧电影音乐半月刊》1948年第1卷第5期。

⑧ 萧挺：《略谈黄色文化》，《新生中国》1946年第1卷第7期。

⑨ 《时与文》1947年第2卷第12期。

⑩ 《新夜报黄色“可爱”：潘公展年老风流 黄色高潮方兴未艾》，《大光明》1946年第13期。

⑪ 廷笙：《黄色气氛 笼罩大后方》，《上海滩》1947年第3期。

“黄色污流”一类提法，在社会上就已纷纷出现。今天尽人皆知的“扫黄”一词，也已问世。1946年，有人提出，对于社会上泛滥的色情、堕落、荒淫的黄色污流，“必须作尽情的‘扫荡’！”^① 1948年，李兆璜在《论黄色文化》一文中，两次直接使用了“扫黄”一词，提出“扫黄”的两个要点，并希望“文化界扫黄的目标应当扩大”。^② 这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扫黄”提法。到1949年时，更出现了明确以“扫荡黄色文化”为标题的文章。^③

可以基本判定，在1940年代中后期，“黄色”的色情含义已经基本定型，尽管并非百分之百纯粹，但即便在不纯粹的使用语境中，“淫秽、下流”的义项也多居于核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色”一词继续广为使用，除色情和粗俗无聊的含义外，其他如夸张、渲染、捏造等意思，逐渐淡化乃至退出，色情之义开始更加突出、强化。1950年，杂文家聂绀弩发表《论黄色文化》一文，将黄色文化界定为：“色情文学，大腿影片，软性音乐和跳舞，猥亵的照片和画片，玩弄女性的新闻和言论等等，谓之黄色文化……它的基本内容是动物性的歌颂，官能的歌颂，肉体的歌颂……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游惰者，没落者，吸血者，一切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人们的意识形态。”^④ 1950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续编》这样定义“黄色报刊”：“指专门刊载色情文章，和无聊的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期刊。结果是传播毒素，腐烂青年的思想。”^⑤ 而1951年杨荫深编辑的《新辞典》对“黄色”的解释是：“荒淫而无聊的，（黄色刊物）”、“反动的，（黄色工会）”，^⑥ 原先的多重含义被抽离出去，色情之意进一步强化。1952年出版的《新订新名词辞典》将“黄色”解释为：“西洋习惯，黄色象征卑鄙污浊，故带低级趣味的淫秽书刊，就叫黄色书刊。”同时，该辞典对“黄色音乐”的解释则是：“黄色是色情的代表，黄色音乐就是一般专以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淫靡恶劣的音乐。反动统治者曾用这种满是毒素的音乐——软绵绵的情调来麻醉并腐蚀人民，使人忘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苦痛，因而也丧失了人的斗争意识，所以说黄色音乐纯粹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⑦

“黄色”一词的淫秽和色情用法并不局限于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亦然。1968年台湾出版的权威工具书《中文大辞典》，把“黄色”定义为“今谓低级趣味涉及男女猥亵也”。^⑧ 1976年台湾出版的《辞汇》也标示：“黄色小说”即内容多涉及淫秽风化的小说；“黄色新闻”即内容淫荡有伤风化的新闻记载。^⑨ 而1972年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在解释“黄”字时，则特别指出其“catering to sex interest”（迎合性的兴趣）之意，并说明此意“borrowed from ‘yellow journalism’, now used more widely”（借用于“黄色新闻”，如今被更加广泛的运用），故“黄色新闻”在“yellow journalism”之外，还可英译为“sex stories in papers”、“黄色小说”则对应“sexy novels”。^⑩ 到1987年，香港出版的《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又将“黄色新闻”固

① 楼棣：《泛滥的黄色污流》，《民潮》（香港）1946年第2期。

② 《再生周刊》1948年第225期。

③ 方远：《扫荡黄色文化》，《文艺生活》（桂林，海外版）1949年第18—19期。

④ 《聂绀弩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560页。

⑤ 赵景深等编校：《新知识辞典续编》，上海：北新书局，1950年，第372页。

⑥ 杨荫深：《新辞典》，上海：广益书局，1951年，第599页。

⑦ 春明出版社编审部新名词辞典组编辑：《新订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年，第5119、8028页。

⑧ 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中文大辞典》第38册，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第430页。

⑨ 陆师成主编：《辞汇》，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76年，第1506页。

⑩ 林语堂编著：《当代汉英词典》，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词典部，1972年，第244页。

化为今日通行的“pornographic reports”之译法。^①如此典型的“文化旅行”变异故事，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恐怕也具有某种独特性。

四、“黄色”词义双重变异的成因分析

在近代中国，“黄色”词义的变异有着双重内涵，一是国人对西方输入的新知概念“黄色新闻”产生误解和曲解；二是中国原本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之黄色出现占据优势的、大众化的矛盾义项——色情、淫秽、低俗，形成同一词义结构内部的雅俗对立。笔者将这一词汇现象称之为“畸变”。在前文，我们曾揭示出西方“黄色新闻”的原义在中国不断缩小词义的范围，其内蕴的淫秽色情部分在其义项结构中被逐渐前置、变成核心，乃至独占义项的过程。但如果仅仅将视线局限于这一过程本身，很可能会夸大其自身转变的内在自然性成分，而不免轻忽其所包含的深刻畸变性。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必须正视和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尽管在抗战胜利以前，“黄色新闻”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淫秽内涵也有被人摄取和强调之处，但这一概念的原义还是大体上得到较为准确的传达，而且这种传达显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黄色”含义真正发生淫秽化变异，是在1946年前后，也即抗战胜利之初。这一点，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抗战刚刚结束，人们从长期战乱的紧张压抑和动荡的生活中舒缓过来，逐渐萌生了争相享乐的念头，正如时人针对低级趣味的色情歌曲再度流行所指出的：“以为抗战胜利，可以歌舞升平了，可以‘复原’到以前的糜烂生活了。”^②而这一情况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社会表现尤甚。此等城市日渐弥漫起一种淫秽色情泛滥、享乐至上等种种社会风气，这实为来自西方而又涵括淫秽低俗义项的时髦之“黄色”命名，以及这一概念的淫秽色情化转换本身，创造了适时的社会条件。1948年，《论黄色文化》一文就明确地指出，“黄色文化最茂盛的是刚刚胜利的时候，因为发抗战财、胜利财、甚至接收财者等等的集中都市，而形成的畸形的繁荣”。^③1949年，《黄色文化的末路》一文也强调，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之所以“黄色文化”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当时“其有闲阶级多，物质引诱强、吃吃喝玩的个人主义很厉害、追求无止境的享乐”等风气盛行，抗战胜利后“黄色”毒氛依旧。^④还有人注意到并揭示了当时造成黄色文化流行的更多社会因素。1946年，《“黄色”的命运》一文就分析说：“社会的腐败、有闲人士生活上的荒淫，正当的文化出版界的冷落……社会动荡不安，物价的高压，生产的废弛，财富的集中，知识分子与公教人员生活上备受的压迫，莫不是使文化衰落，黄色乘机崛起的主要因素。”^⑤此外，还有人提到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它使读者们“看惯了‘胜利八股’，读厌了‘建国公式’”，很快因为苦闷而转向黄色文化。^⑥总之，在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各大城市，淫秽色情文化一度泛滥成灾，引发强烈批评。

对于这一恶俗文化泛滥的现象，自然需要有一个形象的、具有一定整体概括力度的时髦词语去反映和批评，而恰好来自西方的“黄色新闻”一词此时已得到一定传播，于是便被一知半

① 黎明等编纂：《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香港：大盛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181页。

② 袁钊：《从黎派音乐说到时代曲》，《新音乐》（华南版）1946年第4号。

③ 李兆璜：《论黄色文化》，《再生周刊》1948年第225期。

④ 余雷：《黄色文化的末路》，《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7期。

⑤ 《“黄色”的命运》，《宇宙线》1946年第2期。

⑥ 萧挺：《略谈黄色文化》，《新生中国》1946年第1卷第7期。

解的人们糊里糊涂地抓来使用。当然，这也与传统中文里通常被用来表达类似含义的色彩词汇如桃色、粉色等过于局限在“男女暧昧关系”的狭小空间，难以反映和概括内容更为丰富复杂的低级、淫秽内涵，有着一定关系。于是在角逐中，变异的“黄色”一词也就阴错阳差地流行开来。在这一进程中，不少主动使用者最初是一知半解，而更多的人一开始时则是将信将疑、随流从众。如1948年，美学大师朱光潜对“黄色”一词的最初使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刊物消毒》一文中，朱光潜提及“印着电影名星乃至至于妓女照片的红红绿绿的小型刊物”时，就曾疑惑地写道：“我说‘红红绿绿的’，本是事实，不过据说它们的通行的台銜是‘黄色刊物’，为什么是‘黄色’，怨我无知。反正这些就是现在中国一般识字的民众所读的书。”可见当时黄色一词的色情化使用，连朱光潜这样的文化人一开始也没有弄得十分明白，他一方面表示了存疑，但同时在后文中，他却也随众地照搬照用，将刊载“桃色新闻、贪官污吏的劣迹，社会里层的奸盗邪淫的黑幕，以及把这一切乌烟瘴气杂会在一起的章回小说”的刊物，照例称之为“黄色刊物”。此种情形，在当时应当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黄色一词的色情化使用，正如其他流行词语一样，往往有核心而难有边界。朱光潜照例将一些刊载与色情、贪污劣迹混杂事项等有关的刊物称之为“黄色刊物”，^①恰好也表明了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那种既关联又紧张的互动关系。

其次，变异的“黄色”概念生成和流行开来，与抗战胜利后迅速形成的国共对峙、特别是国民党的腐败和遭受各方抨击的舆论环境有直接关联。抗战一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很快被拖入内战泥潭，与之俱来的是社会人士和左翼知识人对国民党的抨击，“黄色工会”概念的“腐败、妥协、麻醉、堕落”含义，黄色文化的麻醉剂和反动堕落含义，成为抨击国民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当时有人就认为，“色情文化是荒淫社会生活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更早以前，在封建君主的宫廷里，糜烂的宫廷生活，就是淫画淫书的制造场……回到收复区来的国民党政府当局竟容许敌伪文化政策的继续执行，甚而怂恿它的继续执行，而对于宣传民主的画报，则封锁压迫，唯恐不力”。^②1946年，学者吴晗指责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封杀民主刊物，却使“色情的黄色刊物摆满了每个报摊”。^③1947年，林默涵也指出，反动派利用黄色小报等色情的东西来腐蚀人心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腐烂和堕落。^④当时还有人侧重于“黄色”的麻醉意味，以反讽的手法揭露国民党的纵“黄”策略，指出“黄色”能麻醉人，使人由硬变软，使人们安定下来，达到所谓的“国泰民安”。^⑤在这里，由“黄色新闻”和“黄色工会”所引发的语义流变，显然已经得以重合。

另外，八年抗战，中国人抗拒的是来自所谓“同文同种”的日本的残暴侵略，这是一次黄种人内部的冲突。而帮助我们的却多是白人国家。于是白黄种族之间的紧张感舒缓下来，“黄色”作为族类象征、东亚内部力量整合的意义严重弱化，这可能成为“黄色”原有的民族尊崇和文化象征含义被轻视、而低俗淫秽意涵得以附体并在大众流通层面迅速占据某种表义优势的一个微妙而深层的原因。1946年，一篇题为《黄色的话》的文章，对当时人们把为求醒目、套印着红色的报眉及标题的刊物视之为“黄色刊物”大为不满，指出：“黄色，毕竟是一种温和的

① 《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② 楼楼：《泛滥的黄色污染》，《民潮》（香港）1946年第2期。

③ 吴晗：《论文化杀戮》，《民主周刊》（上海）第44期，1946年8月11日，《吴晗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08页。

④ 默涵：《垂死的“流氓文化”》，《新华日报》1947年1月18日。

⑤ 如斯：《论“黄色”之可爱》，《人民世纪》（南京）1949年第2期。

色彩，且古今来一致公认它是一种正色，所以人们都欢迎它，乐于亲近它……你祖宗的皮肤颜色，便是黄色的。难道你能反对么？”^① 这类发自民族自我内心深处的抗议之声，在当时却显得相当的微弱，这决非偶然。

“黄色”一词含义的变异，与近代特别是五四后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尤其是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严重失落亦不无关系。1946年，《黄色的恐怖》一文的编者按就写道：“黄色究竟作何解释，却为‘辞源’所不载。记得病名有‘黄疸’……所以上海某报副刊说黄色是病态的象征。黄色刊物就是‘病态刊物’，中国乃‘病夫之国’，所有低级出版品为‘黄色刊物’。”^② 其中所透露的，毋宁说正是一种自暴自弃、自我作贱的民族悲观心理和变态情绪。对西方的“黄色新闻”等一类文化概念中的“黄色”内涵一知半解，便视为时髦，敢于且乐于囫圇吞枣地加以使用，而对传统的民族肤色之象征义、对于那种代表高贵、尊崇的“尚黄”文化传统却如此漫不经心，竟任外来变异的淫秽色情义与之矛盾并存，以至“黄色”形成一种畸形复合的词义结构而不以为意，这在那个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1945年至1949年那个内战不已，政府无暇顾及真正的文化建设，而语言学家又难以尽责的特定时期，实在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今天许多学者对此畸形存在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以为它们之间原本就并行不悖，这一点或许更应该加以反思。

〔作者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陈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李红岩 雷家琼）

① 《海燕》1946年第6期。

② 《益世周刊》1946年第27卷第23期。

族)。He had no connection with Min Yue or Nan Yue or the Nanhai Commandery (南海郡)。He was enfeoffed as king of Nanhai not only because of his relation to the Yue, but also because of his contribution in helping Emperor Gaozu suppress Yingbu's rebellion. In the twelfth year of Emperor Gaozu, when Prince Liu Chang, king of Huainan, was still young, Zhi (then Duke of Nanwu) was enfeoffed as king of Nanhai, with a domain stretching from Lujiang to the Poyang Lake (an area corresponding to southern Anhui, northeastern Jiangxi and western Zhejiang). In the second year of Emperor Wen, a rebellion broke out in Lujiang in Nanhai which was suppressed by Prince Liu Chang, king of Huainan. The surrendered army was resettled in Shanggan. Before long, they rebelled again, but were defeated after a battle on water with the army of the king of Huainan. In the sixth year of Emperor Wen or some time before it, Nanhai was conquered by Huainan. We conclude that the kingdom of Nanhai did not extend across Min Yue and Nan Yue, but was located within the area of the kingdom of Huaina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Yunmen School of Ze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 A Study Centering on the History of Great Sheng An Temple Liu Xiao (70)

The Yunmen School was one of the "Five Schools and Seven Sects" of Zen. It was very prosperou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ut began to decline under the Southern Song. By the end of the dynasty, its transmission can no longer be traced. However, in the part of northern China ruled by the Jin dynasty, the Yunmen school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formed a Vindhyavana group centering on the Great Sheng An Temple. The abbots of the temple, Yuan Tong and Guang Shan, were honored as national masters by the Jin emperors. The school suffered a blow in the Yuan dynasty when Khubilai Khan adopted a policy of supporting Lamaism and suppressing Zen. Bu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s Wuzong and Renzong at the latest, the Yunmen school of Zen enjoyed a renaissance and the abbots Yun Shan and Hui Cong were honored by Emperor Renzong as Grand Master for Glorious Happiness (荣禄大夫) and Grand Minister of Works (大司空), in charge of the affairs of the Yunmen school. With the Linji and Caodong schools, the Yunmen school was one of the three main schools of Zen. This situation lasted until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 Study of the Shift 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Yellow (Huangse 黄色) in Modern China

Huang Xingtao & Chen Peng (83)

The Chinese word yellow (*huangse* 黄色), originally the word for a color that symbolized nobility and dignity, has now also acquired the meaning "pornographic." The word thus has two inherently contradictory meanings. This contradiction i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 and East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the word *huangse* in Chinese represents a transformation of its traditional sense and also differs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yellow* in the Western phrase "yellow journalism" (*huangse xinwen* 黄色新闻). In the cour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semantic context, the word'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have undergone various changes.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its evolution and change 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we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imulat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is topic.

The Customs Revenue Crisis of 1923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s at the Revolutionary Headquarters in Guangzhou

Zhang Sheng & Chen Zhigang (99)

In 1923, the revolutionary headquarters in Guangzhou, represented by Sun Yat-sen, instigated a dispute over the customs revenue, hoping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gain Western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However, the indifference and threats of the Western powers resulted in the bankruptcy of Sun's "agile diplomacy." Beset by external and